

宮崎市定論文選集

上 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譯組編譯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宮崎市定論文選集

上 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譯組編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 1963年·北京

内部读物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

上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11017·183

1963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¹ / ₃₂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7千字
印张 9 ² / ₁₆	印数 1—2 000册
定价(10) 1.40元	

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宫崎市定是当前日本史学界中思想反动而影响較大的“东洋史学家”之一。

宫崎市定生于1901年，现年六十二岁。1925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京都大学）文学院东洋史系。他在大学讀書期間，深受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任教的有名的“东洋史学家”白鳥庫吉、内藤虎次郎和桑原隲藏等人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曾任岡山第六高等学校和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的教师，并在日本陆軍中受过两年訓練。1929至1934年間，他曾两次到我国东北和北京作短期考察旅行。1932年日本法西斯軍队进攻上海时，他曾在日本侵华陆軍中服役，短期駐扎于上海附近。1934年末，他轉任京都帝国大学副教授。1936至1938年，他到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資产階級史学的影响；并曾赴近东各地旅行。归国后，在京都帝国大学任东洋史教授期間，为日本軍国主义效劳甚为积极。1945年日本战败的前夕，他还再一度入伍，当了日寇侵略軍的一員，为挽救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崩潰作最后掙扎。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吞噬中国領土、疯狂屠杀中国人民，并企图控制整个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宫崎是他們的得力的策士。他曾在日本軍部的指使下，写成主要对侵华士兵进行法西斯教育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一书，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噬中国捏造历史論据。他又参加了当时日本軍部主持的“东亚研究所”所編纂的《异民族統治中国史》一书的編写工作，在历史上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統治中国寻找具体的經驗

和先例。这两部书中的血腥气味，正是他反动的史学思想的彻底暴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又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加编写一部《大东亚史概說》，来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捏造历史論据。該书在1945年日本战败时尚未完稿，但宮崎在其后两年，即1947年，把他独自草拟的底稿“原封不动地”出版了，书名为《亚細亚史概說正篇》，并于翌年补写并出版了該书的《續篇》，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并没有丝毫动摇这个反动透頂的“东洋史学家”的迷梦。直到1958年年底，他出版他自己的論文集《亚細亚史研究》第一卷时，在序言中还狂妄地自詡說：“我有一种自信，那就是我在东洋史研究方面，以前的各种见解大体上沒有錯誤”。这就是說，他多年所持的一整套法西斯主义史学观点，直到今天并没有放弃。

自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宮崎一直仍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系任教授。他承袭了日本老牌反动史学家白鳥庫吉和內藤虎次郎等人的衣鉢，在日本资产阶级东洋史学界成了首脑人物之一。最近这些年，他在京都大学曾任文学院院长，现任教养学院院长；同时，他是京都的“史学研究会”和“东洋史学会”两个重要学术团体的主持人。东洋史学会除了大量发表各种专著和論文外，还刊行“东洋史研究”双月刊，编写教科书（如《京大东洋史》等），和多卷本的通俗讀物（如最近陸續出版的《图說世界文化史大系》等），其中都显著地貫串着宮崎的各种荒謬論点。宮崎不仅在日本国内是某些学术团体和刊物的“理事”，而且近几年，在参加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會議方面也相当活跃，和美帝国主义的所謂“汉学家”們进行勾結。去年他旅美归国，曾为美帝国主义的“汉学家”及其老板——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們大事吹嘘。

宮崎三十余年来的写作很多。据我們初步統計，有史学专著

十一种，与他人合著的史学著作六种，论文集三卷，论文（包括已收入和未收入论文集的）将近百篇。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东洋史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许多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是歪曲、诬蔑和捏造我国历史的文字。宫崎的著作有一个特色：不管是专著也好，论文也好，绝大部分只是政论性的“史论”，而不是像某些日本资产阶级东洋史家们那样的、多少还根据些史料对史实进行些考证或阐述的文章。他有时虽然也采取繁琐的考证形式，但那只是他暂时为了把自己伪装为“学者”而不得不采用的一件资产阶级学术外衣。而他在专题论著中，往往则使用曲折影射、隐喻暗示的手法，别有用心地以古喻今，借学术论文的题目和形式来表达他的反动政见。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标的，或者说贯穿着一条内在的黑线，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特的“历史观”，建立一个东洋史的乃至世界史的“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他自认为“通过史实叙述而表现出来的”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而他这一套“历史哲学”几乎一点一滴都是为当前实际政治服务的。在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年代里，他一心为日本“皇军”有“理由”吞噬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的人民捏造历史论据。在日本战败后，这个反动的史学家，一方面由于他对我国历史长期进行肆意歪曲、诬蔑和诽谤的作法符合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一方面也通过他个人在战后开始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暗送秋波”，继而是“卖身投靠”，摇身一变，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鹰犬，依然在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界中进行他的反动活动。

宫崎是以“研究”东洋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起家的，所以在他的“历史观”的“体系”中，对中国历史的一套看法——一套对中国历史独特的捏造、歪曲和诬蔑，当然占着首要的地位。

中国在东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宫崎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实。为了給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中国领土、奴役中国人民的企图捏造历史論据，他便首先从中国“文明”下手作文章。他在《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一书中，集中地宣揚了他的反动論点。他早期的許多专题論文，实际上都是为此书的中心論点准备資料。在他看来，中国的文明就是汉族的文明，其社会他名之为“文明主义的社会”，而这个“文明主义的社会”是纖弱的、頹废的、腐朽的、缺乏生命力的。他认为和长城以南汉族的腐朽无力的“文明主义的社会”相反，长城以北的“北方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强悍的、尚武的、富有生命力的“朴素主义的民族”。他认为中国历代“文明主义的社会”的文明每逢发展到飽和点时，就要趋于頹废、沒落，只有在具有“朴素主义”的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并建立起对汉族的統治以后，“文明主义的社会”的“生活力”才能重新振作起来。然而，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等具有“朴素主义”的北方民族在統治了中国以后，却又都不免因“文明化”而复趋衰頹。于是，中国历史就沉淪在这样个恶性循环中了。到了现代，情况不同了。“北方民族”的历史地位已为日本所代替。他认为日本民族也是个强悍尚武的、富有生命力的“朴素主义的民族”，但其朴素主义不同于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因为日本民族的“朴素主义”具有特殊的“发展性”，是掌握了现代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并且掌握了“調和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的“鎖钥”。日本对中国的統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历史上各“北方民族”的复轍，它的統治不仅能长期永存，而且能“振兴”中国人的“生活力”。他又认为日本不仅应当統治中国，而“建設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也应由日本民族来承担。这就是宫崎这个“东洋史学家”表现于中国“文明”論乃至“大东亚”之“命运”等問題之上的“历史观”。

宮崎在如此誣蔑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同時，又長期热衷于宣揚他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論，以达到他故意歪曲中国历史的发展，建立他具有“世界史体系”的“历史观”的目的。

他摆出一付好像真是独具只眼、探得中国历史的奥秘的架子，建立起一套荒謬的中国历史分期說。他认为中国历史应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自殷周至汉末；二，“中世”，自魏晋至五代；三，“近世”，自宋至清；四，“最近世”，自鴉片战争至今日；他給每个时期随心所欲地强画出一些莫須有的“发展”輪廓，毫无根据地签題上一大堆时代“特征”。

关于“古代”，他认为中国在远古曾存在过一种“氏族制度”。他所謂“氏族制度”，和我們所理解的原始氏族社会截然不同。他所謂的“氏族制度”，意指以同一血族为基础的“宗族全体成員”所組成的小型“国家”，其中根据血統分为貴賤，貴者統治役屬賤者。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曾风行于史前时代。其后，他杜撰出一个世界古代历史发展的共同公式，然后把中国古代历史填装在里面。他說人类古代历史发展的一般公式是：氏族制度——→都市国家——→領土国家——→統一的帝国。他认为在中国，殷周至春秋时代是“都市国家”从形成到衰落的时期；春秋末叶和战国时代是“領土国家”兴盛时期；秦汉是“統一的帝国”时期；并且給每个时期捏造出一些离奇古怪的特点。他否认中国古代曾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他认为封建制度在中国古代也是“若有若无的”。他单从軍事征服、政治联合和統治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組織形式上，来硬画出一条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經的”途径。他这一套“古代史的发展过程”論的目的，无非是企图“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經济形态递遷的历史发展规律。此外，为了貶低中华民族独立的文化創造力，他还掇拾欧美資产階級史家的民族优越論的遺唾，掺入

他的中国古史观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都是从西方輸入来的。他认为西方彩陶的輸入促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西方传来了青銅文化，中国才有了“都市国家”；从西方又传来了鉄器文化，中国才进入“領土国家”和“統一的帝国”。在他眼中，中国人是天生的“劣种”，在古代自己是不会創造什么文化的。

从后汉的灭亡到唐末五代，这七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宮崎名之曰中国的“中世”。他把这个时期称作“貴族政治时代”、“貴族制”、“貴族社会”乃至“貴族主义”，而竭力避免触及当时的封建阶级关系和封建压迫与剝削的本质。他有时也烂用“阶级”一詞，但他所謂的“阶级”，是单指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力地位的分野。在他写的一部将近六百頁的大书《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中，繁瑣地叙述貴族权势和官制官品的变化，只字不触及当时封建社会基本阶级矛盾的实质。

宮崎在他自己捏造的全部中国历史分期論中，最洋洋得意的是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了“近世”这一突出的論点。关于此点他曾反复說教，不下数十万言，并把这个“論点”拿到国际史学界去招搖撞騙。他断言中国自“唐宋以来，資本主义成份即日益发展”，至宋代“資本主义”已很发达。他认为宋代确已相当于欧洲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的所謂“近世”，即已进入了資本主义时代。宮崎的这个論点基本上是承袭他的“恩师”內藤虎次郎的衣鉢。內藤曾从很多方面肯定中国在唐宋之际，社会文化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宋以后的文化已成为“近世的文化”；宮崎則更进一步，从“社会經濟史的研究”方面給他的“恩师”作补充論証。同时对宋代汉族周围的“异民族”普遍产生的“民族自觉”大事渲染，为“异民族”統治中国和日本侵略中国捏造历史的論証。他甚至还說中国历史从宋以后“停止了前进将近一千年”，明清时代的“資本主义”仍未

超过宋代的基础。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在宮崎的笔下已被歪曲到什么地步！

宮崎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也有不少肆意歪曲和誣蔑之处，例如：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只是“盐梟作乱”而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絕不是农民起义”，說它是农民起义的就應該“批判”。他认为劊子手曾國藩等糾合的乡勇是“民兵”，是“人民的自卫軍”。他认为李鴻章是一个“对欧洲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政治家”和“进步人士”，他对資本帝国主义一系列的卖国投降政策都是正确而明智的。他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表示日本是“东亚民族的觉醒”的“先驅”。甚至无耻地說，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旅大，侵入东北，“由此制止了俄国占領滿洲的野心，因而消除了中国的領土被进一步瓜分的危險。”他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創辦工业、雇佣中国工人，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的生活，并使他們放弃了中国的传统而給他們灌輸了新思想。又說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山、修鉄路，中国才得以“近代化”，等等。

此处我們應該特別提的一点，是他对近代史上資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东亚与中国的根本看法。我們知道，自鴉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中国受資本帝国主义日益加深的侵略与压迫超过一百年；但具有伟大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为爭取民族解放，对資本帝国主义曾不断地进行英勇頑强的斗争。到了现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經過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粉碎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統治，获得了民族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国革命的胜利証实了客观历史规律，并且給世界上一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們树立了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輝榜样。对这个問題，宮崎却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頑固地說：“唯物史观专从資本主义方面考察产业革命，这是有問

題的”。那么應該从哪方面去考察呢？他认为得从“产业革命文化”所产生的“国力”方面去考察。說什么欧洲各国自从完成了产业革命以后，“国力飞跃地增进，成为强大的压力，扩张到亚洲各个地区。……在欧洲强大的外力面前，亚洲的内力几乎接近于无力了。……不用說鴉片战争，就連亚罗船事件、以及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几乎是全被外力所左右。”照他看来，一百年来資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是一股无法抵御的势力。进而露骨地誣蔑“中国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竟愚蠢到敢以螳螂之斧当龙車之刃！屡次排外运动和对外战争，都发生了后果，即每次都被外力的重压苛酷地压在身上。”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他指出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卑躬屈膝，任帝国主义恣意宰割。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外力”的控制下，逐步“近代化”。至于作为东亚国家之一的日本当怎样解释呢？他认为日本和中国不同，它是近代化、資本主义化了的东亚“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这只是日本和英美之間不应有的“資本主义各国間的內訌”，結果“对于共产主义的勃兴給予了絕好的机会”。对此他十分惋惜。这就是宮崎这个“东洋史学家”对东洋近代史极端反动的“历史观”。

最后我們再看一看他直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言論，和他的“历史哲学”的核心——“历史的力学”。

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必然成功，資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只要人們認識掌握了这规律，在无产階級政党的领导下对压迫剝削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必将到来。所以，人类历史的前程是可知的。宮崎是害怕这个真理的。他断言：“精确地預见将来，对于人类來說，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事”。这說明了沒落階級的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前途必然

是一个不可知論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指出人类历史中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递变的规律。这个观点，宮崎当然反对。他誣蔑这是“惑乱視听”。他說：“特别是近来階級史观盛行，很多人想仅用奴隶制、农奴制来划分历史时代的时候，如果不非常慎重地体会〔史料〕詞句中表现的实质，恐怕就意想不到地会招来惑乱視听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內因推动的，外因須通过內因才能起作用。宮崎反对这种說法，因为这触犯了她的“历史力学”論，他詬罵說：“一个劲儿地只拿內力（按即指內因——編者）來說明社会的发展，近来已成为令人厌恶的时髦的事！”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結合，通过具体的历史闡述来体现历史发展的和階級斗争的基本规律，从而指出当前革命斗争的方向。这种科学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宮崎也譏諷这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他說：“历史的研究不能依賴已被树立的路标，走向已被指定的目的地。只任他人指点方向，决不是富于创造性的历史家应为之事。”所有这些，都証明他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的敌視。

在宮崎的著作中，这一类反动的語句是举不胜举的。然而，宮崎作为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急先鋒，有时他也会狡猾地窃取一些辯証法和唯物論的詞句，歪曲其概念，以欺騙群众，惑乱視听，結果成为十分可笑的机械唯物論。在他的《历史与盐》和論中国煤鉄的两篇文章中，极其荒唐地认为盐的生产与运銷决定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命运；世界历史的兴衰治乱，完全取决于煤鉄燃料！

至于他所謂的“历史的力学”，就是认为主宰人类历史发展的只有“力”——武力，实力。历史上的一切变化，都取决于国家与人們之間实力的对比关系及其变化。“在历史上，沒有比力更能客观

地衡量事物的了。”他以“力量的对比关系”，战争、征服与统治，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对比），来解释世界历史上各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从“氏族”到“帝国”）。于是，他歌颂征服、“统一”和帝国。他认为帝国（古代的和近代的）的征服与统治，是人类智慧极高的创造。人类历史发展既然全由“力”来决定，所以宫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因而，他也就夸大武器的作用。他说：“战争的性质，一过了石器时代，大概即以武器的优劣来决定胜负。”他认为中国汉代广大的版图是由铁（即铁制武器——编者）产生的。“蒙古人的大规模征伐即由于利用了中国的铁”制造武器。葡萄牙人到东方来，带来了洋枪，“洋枪乃是欧洲近世文化的尖兵”，“这种武器使战争更加激烈，同时使胜败得到彻底的解决，使战胜者的威力得以确立。”“日本渡过了中世的分裂割据时代而实现了大统一……洋枪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败，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武器敌不上美国。这简直是一种武器拜物教。

和宫崎相反，我们重视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而任何时代人民的、革命的力量终究会战胜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这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宫崎的眼睛看到的却只是统治阶级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武器的力量；此外，他看不见任何其他力量。因此，这个“力”的崇拜者就必然陷入这样一个结局，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时代，他认为日本“皇军”的“力”是所向无敌的，因此他歌颂这个“力”，并一心为这个“力”奔走效劳。日本战败后，他的祖国在美帝国主义压迫控制下日子一久，他不仅看不见日本的前途须依靠日本人民的力量，却反而逐渐感到只有美帝国主义的“力”才真是无法抵御的，因此他近年来对这股“外力”不断地进行阿谀逢迎，以贯彻他的“历史的力

学”的彻底性。讀者只看一看他的《东洋史上的日本》一文的种种奴才口吻，便可看出宫崎这个“东洋史大师”已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他今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他本国人民的敌人了。

然而，这样一个反动透頂的“东洋史学家”，在目前日本史学界中却恬不知耻地极力标榜自己的“历史学”是超阶级、超政治和“客观主义”的。他自己說他观察人类历史的“立脚点”，“既不在赤色国家，也不在白色国家”，而是在“相当远的距离，把赤色和白色国家都包括在内的”地方。他自比为“火星上的人”，“写地球上人类的历史”。他說：“对于地球上人类的斗争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火星上的人，从相当远的距离了望地球史，大約是最公平的，而这就是我对历史学的看法。”究竟“客观”何在，“公平”何在，即使不看他的全部著作，仅讀一讀这部选集，也可剥开他的“画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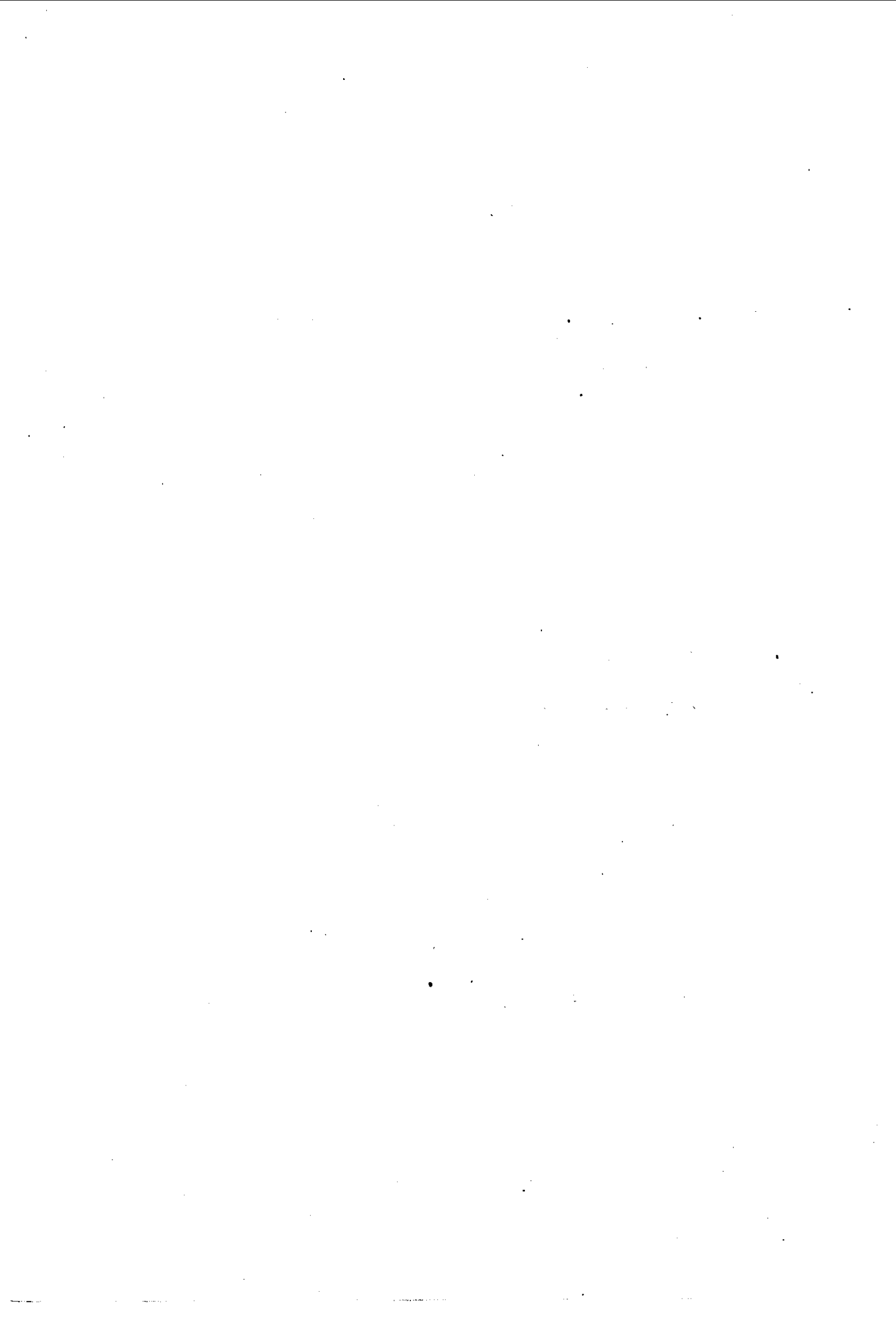
这論文选集分上下二册出版。上册諸論文系由謝家、方紀生、王仲殊、韓潤棠、閻靜先等同志翻譯的；下册諸論文系由謝家、王敦旭、王寿銘、陆秉鈞、史树新、张玉祥等同志翻譯的；譯后曾由孙毓棠同志审校。

編 者

1963年9月5日

目 录

中国古代史概論	3
中国村制的成立	
——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	33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节譯)	55
序	55
第一編 緒論——自汉迄唐——	59
第三編 余論——再論自汉迄唐——	105
宋元的經濟状况	130
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146
宋代的煤与鉄	177
中国的鉄	200
西夏之兴起与青白盐問題	216
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輕工业的发达	230
《雍正朱批諭旨》解題	
——其史料的价值——	241
宋代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271



中国古代史概論

一、何謂中国古代史

何謂古代史？我认为，古代史不仅仅是籠統地指古时候的历史，而是指古代史的发展的过程。然而，所謂古代史的发展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起初分散着的人类逐渐广大地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了所謂古代帝国那样的强大的人类协同体，这种过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

人类的文化，依靠协作而发展。协作的范围愈广，它的方式愈紧密，則协作就愈有效。依靠协作来改善生活，这不仅人类社会是如此，即动物的社会亦是如此。但是，人类发明了語言这一传达意志的方法，以后更发明了文字，互相传授知識，并能使其子孙继承知識，所以能够做到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广大范围的协作。我认为，在考察历史的进程的时候，不能忽視借以从量的方面进行評价的事物的大小和程度的意义。猫凑上三只，也不过是一只猫的三倍，但是人則不然，俗語說，三个臭皮匠凑成諸葛亮，三个人的协作，其結果应该是三个人的力量再加上一个 α 。协作者的人数愈增多，协作的方式愈紧密，这个 α 也就愈大。可以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 α 的增大的历史。

人类所建立的最初的社会协同体是氏族。但是，从历史学說来，氏族制度的时代是在有史以前。因为，关于氏族制度的时代，很少有当时的人自己所作的記錄遗留下来。以后，氏族制度发展而为都市国家。我們所說的都市国家，是西方語 Polis 的翻譯，不能因有都市二字而把它和近代的都市混淆起来。至于都市国家是